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清史稿·地理志·贵州研究

〔清〕赵尔巽等 撰 马国君 编著 杨庭硕 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历史人类学典籍研究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清史稿·地理志·贵州研究

〔清〕赵尔巽等 撰 马国君 编著 杨庭硕 审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稿·地理志·贵州》研究 / 马国君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历史人类学文献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9159 - 8

I. ① 清 II. ① 马 III. ① 地理志 - 研究 - 贵州省 - 清代
IV. ① 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3810 号

《清史稿·地理志·贵州》研究

[清]赵尔巽等 撰 马国君 编著 杨庭硕 审订

责任编辑 / 沈晓枫 史开杰

封面设计 / 邹 刚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25

字 数 / 48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9159 - 8 定 价 / 46.00 元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代总序)

杨庭硕

这套丛书虽然以历史人类学命名,但读者将看到的绝不是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推导,或者仅是吹毛求疵的字词校释,而是几乎可以触摸的文化历史事实再现。在历史人类学看来,历史事件虽然永远不可能重复,但孕育历史事件的文化却从来不允许中断。历史事件不仅专属于古人,也影响着今人。因而,湮没在尘埃中的历史事件,今天的人照样可以真实而全面地认知和理解,也可以和古人一道分享。当然,要完成这样的研究使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严谨的学风、缜密的理论推导,更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避艰辛的执著追求。读者在这套丛书中将感受到的,正是我们多年默默无闻探索的成果。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遥远历史的生动再现。

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之母,又是我国学科体系的强项。但要使我国传统的历史学获得新生,肯定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学术理念。历史人类学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力图做出自己的新贡献。历史人类学并不否定我国传统史学的功绩和贡献,而仅是希望使传统史学与时俱进,获得新生。历史人类学需要做的事,仅止于丰富和完善世人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以利史学的研究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学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规范。这是一个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过程。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与史学截然不同。然而,文化人类学既然要研究规约人类社会的民族文化,文化就必然是历史积淀的总成。以至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并不是天外飞来的外在社会规范,而是着生于具体民族历史过程中的社会规范积累。就这一点而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化从来就是有历史的文化,而绝不是聪明人一次性制定

的刻板条文。就实质而言,文化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几乎与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同步,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历史的理解各不相同罢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者理解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演化过程。需要声明的仅在于,他们理解的历史是整体的人类文化史,而不是具体民族的历史。将民族历史具体化,开创于鲍亚士时代。鲍亚士学派坚持的历史特殊论,使文化人类学向史学研究大大地靠近了一步。但鲍亚士并没有找到将各民族历史具体化的可靠办法。这不是因为他个人缺乏聪明才智,也不是文化人类学自身的缺陷和偏见,而是因为他研究的民族缺乏最基本的历史文献记载,使他无法做无米之炊。斯图尔德开创了文化生态学,力图从生态背景的差异和文化的适应两个角度,去揭示文化变迁的特殊历史过程;从而使各民族历史的特殊论在所处背景的基础上,向各民族的具体历史又前进了一步。但他同样遇到了研究对象文献史料记载匮乏的难题,以致他的后继者内亭尽管意识到了社会历史过程对文化形成的不可替代价值,但却仍然无法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具体化。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大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治学思想多的是历史感,少的是文化观。以致蔡元培和刘师培将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进化论从西方搬过来,去解读中国的远古文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等到人们的情绪冷静下来后,人们立刻发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并不服从统一的进化模型,而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具体历史,或者说仅属于本民族的特殊历史过程。于是围绕着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与中国史学研究的结合,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杨成志将地方志资料引入了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研究,力图改变西方人类学片面强调共时态文化实证而导致的浅薄,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但这毕竟还不是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仅仅是对文本史料的借用。戴裔煊则致力于文化圈形成过程的历史解答,他看到的仍然是文化演化的共性,而不是各民族文化演替过程的具体化。江应樑坚持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考古学三结合的研究,并为此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但却未能提出三者结合的原则和规范,因而仍然只能视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奠基,而不是中国历史人类学本身。

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学科体系,高举实证主义的大旗,将能不

能直接验证作为界定学科性质的唯一依据。从而把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建构起来的一切学科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托于文本史料,而文本史料所提供的资料又无法直接加以验证,因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归属于人文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致使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加以直接验证,成了这门学科的致命缺陷。这就使历史学的研究在西方陷入了困境。要为历史学争取到一个正宗的科学定位,就必须奠定它的直接验证基础。汤因比倡导的比较史学,其目的正在于力争将文本史料纳入可以直接验证的轨范,而这样的努力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在法国萌生了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是由法国的年鉴学派提出的。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初衷,就是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在可验证的基础之上,为历史学的研究赢得科学的正宗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的年鉴学派至今已有了三代的学术传统,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幻术》(1942)、吕西安·费弗尔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1942)、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物质主义与资本主义》、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这些研究传到欧美各国后,又产生了如下一些代表人物,如英国的E·P·汤普森、美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和马歇尔·萨林斯等等。并在20世纪后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港、台和岭南的学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的跃迁,必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探索历程。要将文本史料纳入直接验证的轨范,始终存在着三大障碍。其一是,如何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其二是,跨时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三是,已经丢失的历史信息是否可以重新发掘出来。突破这三重障碍,当然得依托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然而文化人类学的立足点正在于强化共时态的研究,以便使研究的结论可以获得直接的验证。要将适用于共时态研究的理念转而应用于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空域,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学理建构的核心难题。年鉴学派的三代学人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三重障碍,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

人类的历史肯定是一个不可复的过程,要获知历史上某一时空域内

的历史信息,就不得不借助于传世的文本史料。而传世文本史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又因为历史的不可复性而无法加以直接验证。因而,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人对传世文本史料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企图借助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去丰富和发现可以验证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还尽力地发掘和利用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由于这样的文本史料较少受到不同时代官方政治立场的干扰,因而可信度高于官方文本史料。在这一立论思想的指导下,否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权威作用,而将日常的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经济史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就势在必行了。他们的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涵。这一研究传统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传人中也得到了遵循,他们的后继者们从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出发,形成了一些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名著,如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前者以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为依据,复原了14世纪法国西南部一个普通村庄的放牧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等历史面貌;后者则是以英国航海家在太平洋诸岛的航海日志为依据,还原了欧洲人在太平洋探险时代的时空域,并在这样的时空域内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族际关系过程。类似的研究由于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把流传下来的历史信息纳入历史特定时空域内作文化整体的分析,使不可重现的历史信息获得了间接的验证,从而使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获得了间接验证的可能。这样的研究思路对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非官方文本史料的应用被推上了历史研究的前台。同时,研究者们也出人意料地发现,在这些非官方的史料中照样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国家权力影像。在官方史料文本浩如烟海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感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历史人类学第一代学人的某些偏见。任何形式的史料文本都会打上不同时代编修者的烙印,但却不会凭空建构历史,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历史。史料文本通过间接的验证总可以证明其中既包含着可信的历史信息,也包含着编修者的理解和想象。对待不同类型的史料,只能信其可信,去其不可信,而不能单凭史料文本的类型定是非。

历史上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生活与当代社会处于不同的时空域,因而其社会及文化的整体自然与当代社会截然不同。以致属于历史上特定时空域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显然不能用当代的文化观去加以解读。于是,

即使确认了历史信息属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域,要真正弄懂其社会及文化含义,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加以解读,而必须借助那个时代的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文化人类学早就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但这一理论仅是提供了史料解读的原则,而不能代替具体的解读。于是,要将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应用于对历史事实的解读,就必须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明确的时空域;二是,要明确在选定的时空域内,到底共时并存着哪些历史信息。只有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和文化解释方法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作用,并使历史研究获得间接验证的可能。为了突破这一难点,布罗代尔将社会文化作了层次的划分。将人物和事件作为第一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变化速率最快,具有突发性,因而被他称作短时段的历史。第二个层次为社会文化,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其演化速率慢于人物、事件这一层次的内容,但又快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的演化速率,因而被他称作中时段历史。他所谓的长时段历史,也即第三个层次的历史,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这一层次的历史演化速率最慢。在他看来,短时段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表面层次,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十分有限;中时段的历史对历史进程则起到了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的历史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做出这一划分的理论依据是文化人类学泰勒时代提出的文化残留理论,其实质在于,揭示了文化要素的演进具有非等速性。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那些长时段的历史内容不仅可以获得间接的验证,甚至还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因而有进而获得直接验证的可能。

在他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这部分内容,其实质就是他所宣称的长时段历史,也是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那部分历史,因此这部分历史也就获得了直接验证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看重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等等。这些内容显然属于特定时空域的产

物,今天已经无法加以直接观察和验证。对此,他采用了文化人类学所提出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去加以分析和研究。他的这项研究工作实质上是历史人类学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研究使命,即历史信息的解读。这项解读,必须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决不容许以今释古,只能用当时的立场和观点对社会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去做出说明。就这样,他的这一研究个案,圆满地解决了时空域界定和历史信息解读的难题。

该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史、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与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他认为这部分历史属于短时段历史,只是历史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限。即使是两大帝国争霸直接牵涉到的民族,战后改变的也仅仅是其归属,而实际的社会生活则并不发生质的变化。这一结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史学的习惯性看法,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之失去了在历史研究中的独尊地位,而普通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却在历史研究中突现出来。

突破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效结合难关的不仅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的前辈们也对史料信息的解读作了重要的铺垫。吕西安·费弗尔在《拉伯雷与16世纪的不信仰问题》一书中,事实上是重新解读了16世纪的欧洲宗教史。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念,在天主教处于至尊地位的时代,只能是一个极端封闭、极不科学、没有任何创造力的黑暗时代。但在该书中却注意到,传统的史学结论只是在以今释古,而没有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费弗尔看来,宗教的权威仅是表象,在真实的社会中,不信神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社会的进取、个人的创新并没有真正被窒息,而是在为以后的资本主义勃兴作了社会文化的铺垫。费弗尔的这种解读,在布罗代尔的手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先于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各地已经普遍存在。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运作和规范,为何最先出现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才是尼德兰革命,以及日后的英国,这仅仅是由机遇决定的偶然事件,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近年来,年鉴学派的这些工作对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明珂的《羌在藏汉之间》一文,凭借对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兄弟定居传说的解

读,复原了这一传说在权力的拥有和资源分配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使一个看上去并无深意的民间传说获得了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解读,从而使中国无比丰富的传说、礼仪、习惯都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历史研究价值。

特定民族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无论研究其间的哪一个时空域,官方文本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肯定极其有限。凭借有限的历史信息,显然不足以复原历史的全貌。因而,致力于发掘和利用新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了历史人类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从马克·布洛赫到埃马纽尔·勒华拉杜里,在否定官方文本史料权威性的同时,都致力于发掘来自社会下层的各种民间文本史料。但即令如此,他们仍然感到历史信息的贫乏。于是,又理所当然地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凭借社会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本史料信息之外去发现新的历史信息,同时赋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解读。布罗代尔的绝笔之作《法国史》第一卷《法国的特性》就大量地运用了法国出土的考古资料。在他看来,法国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特性还一直影响到今天。在这里,他倡导的大尺度、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并因此为其他学科史料信息的发掘和利用奠定了学理依据。其中,通过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发掘新的历史信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后继者中倡导口述史的解读,则是在他倡导的学理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地延伸。

中国的文本史料尽管浩繁而完备,但在贯彻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时,同样感到历史信息不足。发掘非官方的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在我国近年来的研究中依然能引发强烈的响应。刘志伟通过珠三角村寨空间布局,特别是宗祠空间布局的解读,成功地复原了这些集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其形成而相伴的经济、习俗、社会组织的变迁。这一研究堪称是不动土的考古发掘研究。赵世瑜则凭借早已被人淡忘的宗族记事碑刻,去发掘这些碑刻所处时代的历史信息,成功地复原了不同地区的历史社会生活面貌。这些研究都充分证明,整体的历史虽然不可复,但历史信息却是可以重新发现的,也是可以重新解读的。发现与解读信息,与新考古学的主张不谋而合,都是在发掘中借助于新的技术和方法,提取可靠的并经得起反复验证的历史信息。

今天,历史人类学在我国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上述三大难题的解决,加上我国有丰富的文本史料储备,历史人类学的长足发展,

在我国正当其时、正当其用。为此,我们将大力推出这套历史人类学研究丛书。我们希望将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下去,不仅要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解读官方文本史料,还要解读非官方的文本史料,甚至是口述史资料,而且还要致力于借助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发掘历史信息。要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定型一套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规范,使发端于法国的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真正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式的历史人类学,让历史的研究成为能直接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有用工具。由于工程的浩繁和我们的学养欠缺,我们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批评和斧正,更期望有志同仁积极参与,使这套丛书更具活力,能够为我国广大读者所认同。谨此为序!

2007年3月10日于吉首大学梓园村

序

张新民

《清史稿》一书，乃民国三年（1914）设立清史馆，由馆长赵尔巽主持修纂之事，前后历时十四年，始初告竣役者。先后参与兹事者达二百余人，其中如柯邵忞、缪荃孙、王树枏、夏孙桐、马其昶、吴廷燮、张尔田、金兆蕃、秦树声、王式通、朱师辙等，均为一时之名流。书成后柯邵忞、夏孙桐复又修订。惟刊行仍嫌匆忙，先印成于沈阳，复重梓于北京，遂有关外本与关内本之分，体例内容亦存在差异，加上书成众手，统稿粗疏，历来批评讥刺者颇多。尤其由清转入民国，社会政治急遽变动，舆论风气不断转移，而纂修者仍以遗老立场回护清廷，势必难为后来之激进话语所宽容，故除关外本与关内本外，虽应社会之需，以后仍不断重印，然多视其为资料之书，殊少有人以为可忝列著作之林也。

纪传体正史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基本体例以来，历代累积者已足以成为一大完整之系统。《清史稿》虽为未定本，然大纲节目已备，篇目计有本纪十二，志（新增《交通》、《邦交》诸志）十五，表十，传（类传与本传）十五，体例结构一如传统纪传类正史，实为同一典范影响下之晚出者，仍可归入历代正史之学术谱系——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从典范转移之角度观察，自《史记》创例，迄《清史稿》收尾，传统纪传体史书经历之时间不可谓不长，只是晚近以来“西学东渐”，“史界革命”（梁启超语）成为时代主流，传统学术发生明显现代性转型，《清史稿》在新旧交替过程之中，逐渐成为传统史学修纂闭幕收场之象征，世人皆视为既陈刍狗，轻忽蔑视乃势所必然。评价之低，已超乎想象。足证政治与学术既不能区分，则往往两败俱伤，《清史稿》作为一大重要事例，岂不发人深省乎？

然而《清史稿》刊行以来，利用征引者数量仍然不少。朱师辙便撰有《清史述闻》凡十八卷，涉及当时修纂之各种具体情况，又辑录不少时人

评论商兑之文,实为研究《清史稿》之最早专书。武作成亦有《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一书,增补原书失载漏收者甚多,合经、史、子、集四部计算,共达10438种,93772卷,数量之多,几可相互比肩。故称其为增补固然允惬,谓为新撰亦距离事实不远。诸如此类,均可证明原书暗中仍受人重视。据金梁《清史稿校刻记》:“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可见《清史稿》依赖群力,仍保存大量原始资料,其中尤以历次所修国史旧志及本传最为重要,新增及采访所得者主要为晚清史事。故欲研究有清一代史事,此书仍为必然依赖之基本文献,切不可因其乖讹错舛之处甚多,遂轻易弃之而不观矣!即以《艺文》一志为例,武作成虽做了大量增补,仍不可说已网罗无遗,必须以二书合而观之,始能一窥清人著述之整体全貌。如若谓取后即必废前,恐仍为有欠公允之武断结论耳!

《清史稿》涉及贵州史事者甚夥,亦当为治地方史者所注意。人物传中凡因政治兵事宦黔,或贵州人物事迹卓著者,均一一笔录入史,载之颇详。而《土司传》更有贵州专篇,虽仍嫌简略粗疏,难厌治史者求详求备之心,但仍可取与其他地方史籍互观比较,以求折中一是,获得可靠之结论。传末有句云:“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录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录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可见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其整体之发展趋势为改土官设流官,但亦承认较为松散之朝贡体系仍有其存在之合理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明史》条称土司,即“古所谓羁縻州,不内不外,罅隙易萌,大抵多建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所谓“自为一类”,即别立一《土司传》,其例亦创自《明史》,《清史稿》踵而仿之。然从中仍可见土司实为一特殊制度,既有别于“牧民”之郡县管理,又非完全敌对封闭之外在势力,当属于朝贡体系之大范畴,最终则通过国家与地方之长期复杂性互动,出现郡县制之内地化转型。至于《地理志》载贵州疆域与政区,逐条缕陈铺叙,一概均以清代沿革变化为限,则似较他篇完备。计清季贵州所领者,共有府十二,直隶厅一,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四,土司五十二。检读《清史稿·地理志·贵州》部分,其建置情况皆可略得窥知。如欲进一步求其详备,则不妨参以《清实录》、《清一统志》、《黔南识

略》诸书,多方面钩稽折中查考核对。

马国君博士长期研治人文地理,潜心搜考西南民族生态之事,因深感文献解读对研究工作之重要,乃取《清史稿·地理志·贵州》部分,一一逐条详加考释,用力之精,爬梳之细,均非一般浅学浮知者可比,实有古君子笃实敦厚之风。尤其难得者,为方便读者理解其所疏证之《地理志》,理清贵州行政区划沿革变化脉络,了解清廷调整地方经营政策之宏观背景,作者又于篇前冠以《历史时期贵州行政区划沿革总述》长文一篇,以作导论;篇后则殿以《论清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清朝经营黔东南政策的演变》、《明清两代贵州卫所置废动因管窥》、《清代贵州汛塘制度研究》、《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政策的演变》五篇专题论文,予以补充。通读之后,即不难发现,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腹心枢纽之地,山川盘迂交错,世居民族复杂繁多,生态劳作方式各有不同,社会组织结构亦略显差异,历代中央经营开发,或羁縻,或土司,或郡县,乃至用兵之轻重,剿抚之先后,设置范围之广狭,干预程度之大小,均一方面不能不考虑自身之控驭能力,着眼于全国战略布局之基本稳定,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地方权力实体客观力量之具体存在,受制于差别性极大之自然生境及习俗文化风气。张弛之间,皆必有缘由。国家与地方之间长期磨合互动,最终结果则为铲除一切阻隔,促使各族人民加强联系,相互联结为大一统格局下之同一政区。各历史时期之地方权力体系构成形式不一,政区设置疏密程度亦有差异,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相互依存并形成多元灿烂文化,大一统之向心力始终十分强大。尽管尚存在明显之区域差序格局,却不能以个人主观之“异内别外”观念妄加区分。

值得一提者,贵州虽僻处西南一隅,然其发展变化亦与全国政局之兴盛起伏息息相通,形成连环互动之整体格局。而中央政权经营西南地区,或张或弛,或紧或缓,亦同样必须兼顾西北、东北、华南等地区声势相倚盛衰连环之关系,依据利害轻重孰大孰小之整体政区格局,作出恰当适宜之战略决策判断。故研究贵州乃至西南地区之经营开发历史,仍有必要从全国宏观大格局加以适当定位。反之,了解全国性宏观大格局之连环关系,亦有助于加深西南边地经营开发实情之具体了解。曩昔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述论稿》一书,其中便有“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专篇。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

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当时唐室对外关系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单独性也^①。”

按照陈寅恪先生之具体分析,当时能与中央王朝抗衡者,主要有四:突厥、吐蕃、回纥、南诏,它们相互之间已形成盛衰连环之军事活动大格局。此中之关系纷纭复杂,固不必在此一一赘述。可论者仅李唐中央王朝战略经营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东北方面则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策。而唐初之所以能以屈辱破败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唐室君臣之奋发自强,一方面则缘于突厥内部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而回纥之由强大而灭亡,则又由于坚昆之兴起。至于吐蕃之由盛而衰,亦使唐室得以收复河湟。西北边境遂因此稍得安谧,然其为患已有二百年之久矣。吐蕃衰败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趁势兴起。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成为北部边患,与北宋一朝相始终。可见吐蕃一族之盛衰与其他外族之连环性,实关系吾国中古史甚钜,举凡中央政府之重大战略决策,往往均结合邻接吐蕃之诸外族而展开,目的无非是实施包围瓦解之秘计。正是因为吐蕃强盛达二百年之久,故即使正值唐中央王朝极盛之时,亦殊少在东北有较大之作为。竭尽全国武力财力积极进取者,始终都为西北边疆之开拓,大要仍在借此以控驭中亚细亚,确保关陇地区之安全。甚至高丽既克之后,很快便又放弃,原因亦与吐蕃之严重威胁有关。这一消极维护东北地区之国策,不仅影响李唐一代之政局大势,亦牵连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足证外族衰盛连环性之重要,实乃治古史者不能不关心之一大关键问题也。

陈寅恪先生详细分析外族衰盛之连环性,作为一方法论之示范,实有裨于治西南史地者拓展研究思路,增广观照视域,避免就事论事可能造成之踳踬或偏狭。有趣的是,国君博士虽为后进青年,治学却有较为宽广之

① 陈寅恪著:《唐代政治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页94。

视野,同时又重微观局部之细节分析,虽未必就熟悉陈先生盛衰连环之学术分析理路,却依然显示出方法论上某些微妙之一致。当然,亦可说只要尊重历史事实,着眼于全国宏观大局与地方局部之互动性整体发展态势,便会得出与诸族盛衰连环性相似之结论。如汉武帝经营西南,前后历时二十年,最终则以广置郡县完成此一伟业,虽然历代史家多以好大喜功评之,然武帝最初本意仍在取道牂牁,策应进攻南越,同时兼可打通由四川至身毒之通道。而南越既破,遂移兵西南夷,铲除地方割据势力,设置代表国家一统行政力量之郡县。则西南与南越之盛衰连环性,实已早见于秦汉时期之史实。而贵州地处长江与珠江之中上游,非仅向南可以进入珠江地区,与南越连成一气,而且向东亦可直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巴蜀息息相通。故经营稳定贵州,必有助于控制南越和巴蜀。而秦汉以降,长期施行者皆为羁縻体系,西南地区仅受制于贡赋制度,原有之制度习俗均受到合理承认,亦与中央王朝之武力财力多用于经营西北不无关系,甚至直接就是中原地区动乱并失去经营控驭能力所致。中国之边患兵役,历来皆为北方重而南方轻,北方与南方合成之连环性,亦决定中央经营开发地区之向度与力度,根本目的仍在消弭边地威胁,确保核心要区安全稳定。

当然,西南地区获得大规模之经营开发,主要仍集中在明清两代。举凡建立贵州行省、设置卫所等一系列经营措施,从明代中央王朝之决策视域看,均主要针对残存在云南之蒙古势力,避免重蹈南宋受元兵南面弧形包围袭击之灭亡覆辙。而西南蒙古各部长期纷争,至明代后期乃重新整合。故一统后之清廷,仍然必须面对与前朝相似之问题,即如何切断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将西藏、川西及滇西北统合为一地,实已形成直接威胁中央王朝态势之弧形包围圈。按照国君博士之分析,面对此一政治军事大格局,西南地区便成了清廷内陆边防之“软肋”。故中央王朝之所以集中大量武力财力,确保贵州驿道之畅通,铲除领地毗连之乌撒、水西、普安等土司,大范围地“裁卫并县”扩大编户齐民,都与此一宏观战略有关。可见稳定西南政局有利于西北问题之解决,而解决西北问题亦可强化西南之稳定。西南与西北亦构成一盛衰连环性关系格局,合成中央王朝必须随时留心强化之全国性边防体系。正是通过西南地区一系列政治与军事政策之调整,清廷才最终取得消灭准噶尔蒙古之胜利,加强了西

北与西南内陆边防之安谧与稳定。所以国君博士特别强调,不能人为地将北部、西北部、西部、卫藏及西南地区视为毫无关联之区域,否则便难免不发生见树不见林之认知错误。具见陈寅恪先生所开辟之广阔治史道路,现在已有了越来越多之继承者与发扬者。

人文地理作为一项研究事业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但关注代表历史发展主体精神之人类本身,而且必须透过时间性与空间性来考察其活动之具体性或特殊性。空间体系涉及不同区域之差异性格局,将其与反映事件内在理路之时间性合观,当有裨于了解复杂人群活动之互动,摸清其内在之关联性或渗透性,掌握历史发展脉络之整体性与结构性,亦即时间与空间结合所展示出来之盛衰连环性。国君博士治史有得,成果甚多,特别是深研人文地理,多着眼于宏观与微观之结合,即使极为微细之研究题域,亦能展示其宏观之意义,虽百尺竿头,尚须更臻完善,不能不戒慎努力,刻苦奋发,然成绩仍可喜可贺,值得向世人推荐,不能说不有裨于学林。故余既喜是书之杀青,又深感其屡请之真诚,乃爰缀数言,权当砖引,或亦可为读君书之一助焉。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谨识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崇德室